責任編輯：凌瀚 2026年11月10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

# 行政立法良性互動 合力發揮「香港隊」優勢



立法會與特首、行會成員及政府官員昨日舉行午餐會，意義重大，傳達出一種制度信號：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已經從回歸初期乃至數年前的緊張對峙，轉向一種以「香港隊」為身份認同的良性互動的合作模式。立法會主席李慧琼將今屆立法會的轉變概括為從「重對抗、低效率」到「重協調、高效率及鼓勵團隊合作」。這一判斷的背後，是香港政治生態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經歷深刻重塑後的結構性變化，既是特區良政善治的必由之路，更是提升特區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嚴剛 立法會議員

此次午餐會彰顯的是特區政府對立法會作爲憲制機關的制度性尊重。行政與立法機關在基本法框架下各司其職、互相制衡、緊密配合，這是特區管治架構的憲制原則。特首以創新方式深化行政立法互動，其意義在於將這種互動從偶發的溝通升級爲可預期的恒常機制。當特區政府主動向立法會靠近，立法會也以建設性姿態積極回應，雙方共同降低的是香港政治運行中的治理成本，提升的則是治理效能。

## 互相配合 提升施政質效

緊密配合特區政府施政，是立法會的憲制責任，而非政治選項。 基本法賦予立法會審議法案、批准公共開支、監察政府施政等職權。這些職權的行使方向應當是「助力施政」而非「阻撓施政」。李慧琼所言「立法會是政府進行改革的夥伴」，正是對這一憲制定位的準確詮釋。配合施政不等於放棄監察，而是將監察的重心從政治對抗轉向技術性審視和建設性修正。今屆立法會的高效率，體現在法案審議周期的縮短和實質性修正的增加。這種明顯轉變的制度意義在於：立法會擔任了特區政府的「效能把關人」，二者共同對香港的整體利益負責。

在「一國兩制」框架中，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同屬愛國愛港的「香港隊」，各守職責、目標一致、良性互動，是特區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制度保障。「香港隊」這一表述的精髓在於，承認角色差異的前提下確立共同目標。特區政府負責施政規劃和資源調配，立法會負責法律授權和公眾利益把關，二者如同一支球隊中的進攻與防守，分工不同但勝負與共。當雙方都以「香港整體利益」爲最大公約數，制衡就可以是建設性的，互動就可以是增值性的，監督就可以是良性有益的。這種良性互動所釋放的制度紅利，最終體現爲特區政府的施政效率、立法會的立法質量以及香港市民的獲得感。

## 以北都建設作為檢驗試點

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是檢驗立法會與特區政府良性互動成效的主要配合場景。《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經過法案委員會的嚴謹審議，將於明日正式提交立法會大會二讀。這一時間節點本身就說明：法案委員會沒有因爲「配合政府」而壓縮審議時間，也沒有因爲「嚴謹審議」而拖延立法進程，二者之間的平衡體現了「高效率、重團隊合作」的議會新文化。更值得關注的是，眾多議員在法案委員會發言中就北都發展的土地徵收、產業導入、跨境要素流動、片區開發聯營等範疇提出了大量切實可行的建議。期望特區政府積極考慮並採納這些建議，使立法會的審議成果眞正嵌入北都建設的執行環節。

特區政府正在推動落實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這意味着香港的施政議程已經深度嵌入國家發展大局。立法會在這一進程中的角色，不是被動地爲特區政府的對接方案蓋章，而是以立法和監督職能確保對接的精準性和實效性。當立法會與特區政府在密切互動中構建良政善治，始終以國家大局爲重、以持續發展爲要、以市民利益爲先，充分發揮「兩制」優勢，香港才能眞正做到更自信、更堅定地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立法會與特區政府已然形成的互動模式，其意義不僅在於解決眼前的具體發展問題，更在於爲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積累可複製、可延續的制度經驗。分工不等於對立，制衡不等於牽制，配合不等於附和。當立法會與特區政府都以國家大局和香港整體利益爲坐標，良性互動就不是政治術語，而是制度使然，是治理效能，是發展紅利。

# 堅定航向乘勢而上 匯聚民族復興磅礴力量

鄧飛 立法會議員



《人民日報》日前刊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理論學習中心組文章《堅持「一國兩制」正確航向 推動港澳共赴民族復興偉大征程》。文章深入闡述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的深刻戰略論述，系統梳理了新時代推進「一國兩制」事業高質量發展的實踐邏輯。不僅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彰顯了中央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的堅定意志，更爲處於由治及興關鍵階段的香港，指明了前進航向，明確了時代坐標。

文章開宗明義指出促進港澳繁榮穩定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間的內在聯繫。這絕非權宜之計，而是貫穿中國式現代化全局的根本遵循。「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創舉，實踐早已證明，它是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正如文章列舉的亮眼成績，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進程中，不僅穩固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更在世界競爭力排名中升至全球第二，並首次超越瑞士成爲全球最大跨境財富管理中心。這些客觀指標有力粉碎了美西方外部勢力對「一國兩制」的攻擊抹黑。

## 「一國兩制」是繁榮穩定最大底氣

這種制度自信正是香港社會行穩致遠的底氣所在。長期以來，部分外部勢力企圖將「一國」與「兩制」人爲對立。港澳的根脈在祖國，未來在祖國。香港社會各界必須從歷史邏輯、現實需要和戰略全局出發，深刻認識到國家的繁榮強盛是香港最大的依託，而保持香港獨特地位則是國家戰略布局的重要考量。港澳要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發揮自身所長，回應國家所需，形成「祖國支持港澳、港澳貢獻祖國」的雙向賦能新格局。「融入」是前提、是路徑，「服務」是目標、是昇華。

當前全球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單邊主義與逆全球化抬頭，外部遏制打壓加劇。愈是面對風浪，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戰略價值就愈加凸顯。香港絕不能滿足對傳統路徑的依賴，而必須以改革創新的思維主動破局： 其一，全力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與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布局，將其作爲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的重要引擎，打破過往產業結構相對單一的瓶頸；其二，持續深化普通法制度、國際化專業服務及資產管理等既有優勢，當好內地企業「走出去」與海外資本「引進來」的「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 其三，在教育與人才領域發揮樞紐作用，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吸引全球頂尖科研資源與智力資本匯聚香港，爲國家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貢獻力量。

## 落實「愛國者治港」做好青年工作

文章精闢指出，「愛國者治港」是不容動搖的根本原則，而落實原則的關鍵在於「選賢任能」與「提升依法治理效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按照德才兼備的標準選賢任能，廣泛吸納愛國愛港立場堅定、管治能力突出、熱心服務公眾的優秀人才進入政府。」這對特區管治團隊以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提出了更高的履職標準。「德」在於愛國立場堅定不移、忠誠履職；「才」在於具備破解深層次矛盾的硬本領與開闊視野。特區管治架構必須革新理念、敢於啃硬骨頭，以實際治理成效取信於民。與此同時，必須廣泛團結工商界、專業界、教育界及基層社團，以愛國愛港爲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形成推動社會發展的澎湃合力。

安全與發展是一體之兩面，安全底線愈牢，開放發展的空間就愈廣。維護國家安全是一項常態化、長期性的憲制責任。我們必須堅決防範外部干預與各類非傳統安全風險，健全各項法治屏障，方能確保香港這顆「東方之珠」在風雲變幻的國際環境中乘風破浪。文章對「建設更和諧的港澳」寄予厚望，要求支持特區以人民爲中心，切實破解住房、教育、就業、養老等民生難題，使全社會「心氣更順、發展的勁頭更足」，直擊香港社會發展的關鍵。良政善治的落腳點，終究是廣大市民對美好生活的獲得感與幸福感。

作爲長期深耕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筆者對文章提出「用心用情做好青年工作，多措並舉破解青年發展瓶頸」尤感共鳴。青年是香港的未來，也是民族復興的生力軍。做好新時代青年工作，關鍵在於兩個維度的貫通： 第一是「培根鑄魂」，大力弘揚愛國主義主流價值觀，強化憲法、基本法及國情歷史教育，增強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感與民族自豪感； 第二是「搭橋鋪路」，着力解決學業、就業、創業、置業等實際困難，暢通向上流動渠道，主動引導青年拓展視野，將個人志向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強國建設的壯闊征程之中。

# 民主黨橫掃兩院 特朗普應反躬自省

何志平

日前結束的美國中期選舉引發全球關注。民主黨奪得國會眾參兩院控制權，並在多州贏得州長職位，取得壓倒性勝利，令共和黨乃至美國總統特朗普顏面盡失。這場「藍色浪潮」不僅讓民主黨橫掃共和黨傳統紅州，兩院雙雙易主，更是對特朗普個人執政能力的一次民意評價。隨着美國政壇權力格局進入深度重構階段，國際社會正重新評估特朗普政府未來兩年的政策走向。

本次中期選舉衝擊力遠超選前多數民調預期。在參議院關鍵爭奪中，民主黨在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俄亥俄、得克薩斯、堪薩斯及艾奧瓦等州成功翻盤。其中得克薩斯州30多年來首次選出民主黨參議員，象徵意義極大；北卡州民主黨人的勝選，直接打破共和黨在該州18年連勝紀錄。眾議院方面，民主黨同樣勢如破竹。這意味着特朗普剩餘任期內，立法議程將面臨國會強力掣肘，眾議院甚至隨時發動彈劾程序。但要彈劾成功，也並非易事。美國歷史上還從沒有總統被眞正罷免過。

## 內鬥加劇 相互掣肘

特朗普在法理程序上基本是安全的，並沒有下台的政治風險。只不過，要面臨持續的彈劾，會從權力、調查、黨內地位、後續大選幾個層面，提前把他從鐵腕強勢的施政風格逼向「跛腳鴨總統」過渡。對性格張揚、信奉零和博弈的特朗普來說，後兩年執政之路將會非常憋屈、難受。

其一，兩黨政治博弈加劇。民主黨同時掌握兩院後，可通過議程設置、財政撥款、委員會調查和人事任命審核等方式加強對白宮的制衡，特朗普推動減稅、福利削減和移民改革等重大立法的難度明顯上升，政府撥款和債務上限博弈或更加頻繁，同時還可限制內閣及司法任命。

儘管如此，特朗普仍掌握行政權和總統否決權，在關稅、外交和軍事等領域具有廣泛且獨立性極強的裁量空間。否決權是美國總統制衡美國國會權力的主要手段，根據美國憲法，國會兩院通過的法案須提交總統簽署，總統可選擇簽署，也可行使否決權將法案退回國會；但若眾參兩院分別以2/3多數再次通過該法案，便可推翻總統否決，使其成爲法律。

特朗普在11月3日深夜表示「絕對願意接受選舉結果」，但又明確將以否決權作爲應對民主黨立法議程的核心工具，預示着華盛頓將進入立法僵局與否決政治並存的格局。既然政策方向難以被全面逆轉，施政重心可能更多轉向行政命令和對外政策。民主黨控制國會阻撓特朗普內政施展空間，反過來特朗普照樣可否決民主黨想通過的所有法案，雙方都沒有拿到完整的立法權。

## 對AI監管將加強

其二，財政擴張空間受限，債務上限博弈升溫。民主黨雖能壓縮新增財政擴張空間，卻難以改變美國高赤字、高債務的長期趨勢。白宮主要財政政策「大而美」法案已通過落地，共和黨日後無法再利用預算調解程序進一步減稅或擴大國防支出。在新增財政立法受限的情況下，債務上限或成兩黨財政博弈焦點。



民主黨即使能主導預算調解程序，推動增加民生支出或調整稅收政策，但特朗普手握總統否決權，重大財政轉向仍需兩黨妥協，財政政策大概率延續現有框架。民主黨可能將提高債務上限與增加民生支出、延緩醫療補助削減等訴求綑綁，特朗普及共和黨則希望減稅並保障國防和邊境安全。兩黨分歧使得談判難度上升，階段性收緊流動性、放大金融市場波動。

其三，AI投資擴張延續，監管約束邊際強化。民主黨將強化對AI立法與監督，但難以改變AI投資持續擴張的總體方向。特朗普主張加快AI基礎設施建設並反對強制許可制度，相關限制性立法仍會面臨總統否決，全國性暫停AI投資或數據中心建設的概率較低。在聯邦層面全面限制AI投資難度較大情況下，州和地方政府將成約束數據中心建設的主要力量。監管收緊更可能帶來行業和地區分化，而非終結AI投資周期。大型科技企業電力、合規和建設成本上升，市場將更加關注資本開支效率。

## 內政受阻或將專注對外事務

其四，內政立法空間收窄，行政權與對外關係或成突破口。關稅、制裁、出口管制和有限軍事行動對新增立法的依賴相對較低，特朗普仍擁有較大施政空間，或更加專注於推行不可預料的外交政策。據路透社報道，白宮已着手梳理可繞開國會推進的行政措施，包括對關鍵礦產等商品加徵關稅、調整聯邦資金用途和強化移民限制，以及用「軍事指揮權」發起軍事行動等。未來兩年美國政策的單邊性和不確定性仍可能進一步上升。

關稅政策將受到更強監督，但全面逆轉的可能性有限。民主黨或會在兩院推動廢除部分關稅、限制總統關稅權限，並圍繞關稅豁免、貿易談判和物價影響開展調查；但多數相關法案即使獲國會通過，也可能遭特朗普否決。因此，既有關稅大概率延續，面向所有貿易夥伴的普遍關稅和對盟友加徵關稅或受到更多制約。

其五，對華戰略競爭不會輕易動搖，中美博弈長期框架勢必複雜且可控。一是民主黨控制的國會可能對中美科技競爭採取更系統化、多邊化、制度化的立法圍堵，而非特朗普式的關稅突襲。由此產生新的不確定性，中企要更注重合規與供應鏈長期韌性。二是美元若因財政收斂與監管預期階段性走弱，人民幣匯率外部壓力將有所緩解，但若中東局勢推高油價，輸入性通脹風險仍需警惕。

# 加強區域協作 擴展航空網絡

霍啟剛 立法會議員

剛好有理



今年三月發布的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再次明確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及航空樞紐地位，並提出要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港口、機場和軌道交通協同發展。特區政府早前公布的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亦確立了「持續擴展國際航空網絡」和「深度參與國家航空網絡發展」兩大發展方向，明確在未來五年與更多民航夥伴探索加強聯繫、將香港國際機場的全球航點由220個增至240個，以及爭取本地航空公司開辦更多往來內地機場的航班等多個工作目標。

這亦是筆者一貫的關注和主張。早於上屆立法會任期，筆者已聯同其他G19議員約見特區政府和機管局，就如何在疫情後盡快恢復國際航班、重振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集思廣益。今年初的全國兩會，筆者以全國人大代表身份提出了三項有關加強兩地航空合作的建議，包括推動香港國際機場融入國家民航體系。到上月，筆者再聯同「G19航運、航空及遊艇經濟推動小組」舉行記者會，發表「擴展香港航空網絡」共同倡議，以及於立法會就「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提出口頭質詢。

## 香港機場增長空間很大

香港國際機場的軟硬件世界馳名，多次獲選爲全國乃至全球最佳機場，第三條跑道與二號客運大樓近年先後落成，理應有更多拓展空間，爲香港的旅遊業、貨運業，以至國家的高水平對外開放作出更大貢獻。但現實是疫情已過去多年，三跑已啟用近兩年，使用香港國際機場的旅客人次只回復到疫情前約九成，當中中轉旅客人數更恢復不足八成，有很大增長空間。

貨運方面，雖然香港國際機場已連續15年成爲全球最繁忙的國際貨運機場，但近年增長率只有2%至3%，反觀區內多個機場貨運量都增長強勁。例如上海浦東國際機場去年便有8%，今年頭幾個月更高達15%，預計兩至三年內便可超越香港。

香港國際機場客貨運量增幅遲緩，主因是航線及航班不足，尤其長途航班，部分在疫情時撤離或削減航班的外國航空公司，遲遲未有重返香港或恢復航班數量，導致整體機票價格及運費偏高，促使部分旅客與貿易商選用區內其他機場。隨着兩地跨境陸路交通愈趨方便，亦有愈來愈多港人選擇前往深圳、廣州或更遠的內地城市轉飛海外。有的甚至會先飛往新加坡、日本或韓國玩一兩天，然後再轉飛歐美等地。上述情況令香港喪失了不少中轉旅客、中轉貨運，以及相關的旅遊、消費和物流業務收益。

## 為受影響地區旅客提供「安全港」

國際航空市場近年出現的另一重要變化，是俄烏衝突與中東局勢持續動盪，打亂了許多國際航線、航空公司和區內機場的營運，一些中東國家急於將部分空運業務分散到其他地區，新加坡樟宜機場及韓國仁川機場正在積極爭取。香港的空域及機場均非常安全，我國與相關國家關係良好，應當更主動把握有關機遇。

G19的擴展航空網絡倡議共有11點，包括通過放鬆航權限制、提供機場費用優惠、稅務優惠及航班增長獎勵等，吸引更多海外及內地的航空公司落戶香港，以及鼓勵現有(包括本地)的航空公司加開更多航線和航班。

另一關鍵是與內地探討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民用空域協同管理模式」，參考歐盟的「單一天空」概念，新加坡的「開放天空」政策以及與其他東盟國家的合作模式，強化大灣區城市與機場的航空協作，從而增加與歐盟、東盟等區域探討加強合作及開放航權的籌碼，提升總體客貨運量和經濟效益，同時落實國家「十五五」規劃強調的錯位分工，減少內卷。

上述建議不單有助增加航班供應和競爭，從而降低票價與運費，惠及旅客和貿易商，對於香港的旅遊業、物流業及整體經濟發展，乃至協助內地出口企業「走出去」、貢獻國家的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也有裨益，希望特區政府及有關部門認眞研究考慮。